

目 录

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

一、百灵庙“蒙古自治运动”片断.....	(1)
二、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前后.....	(16)
三、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始末.....	(58)
四、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成立与瓦解.....	(88)
五、北平三年.....	(138)
六、搞“西蒙自治”经过.....	(156)
七、赴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经过.....	(189)

“百灵庙蒙古自治运动”片断

一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四省，内蒙古东部各盟旗也随之沦陷。继而日寇又向西部各盟旗伸其侵略的魔掌，与热河接壤的锡、察两盟便首当其冲，以致人心动荡，惶恐不安。适在这年冬，蒙古各蒙部旗联合驻京办事处处长兼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吴鹤龄，将他一手制定的“蒙古各盟部旗组织法”呈请国民党中央政府明令公布。我当时是苏尼特右旗扎萨克亲王兼锡林郭勒盟副盟长，锡林郭勒盟盟长索特那木拉布丹（索王）因病请假，由我代理盟长职务。我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就托滂江电报局长徐茂候代拟电报稿，盖上盟长大印，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拍发，反对吴鹤龄的这个“组织法”。同时，我派锡林郭勒盟驻张家口办事处处长补英达赖赴北平面见陆海空军副司令张学良，洽请拨给枪枝弹药等物，并联络包悦卿、贺喜业勒图默尔根（号颖伯，即小卓王）、达密林扎布（太仆寺旗前任总管）等，以蒙古旅平同乡会的名义也致电国民党中央政府，一面反对吴鹤龄的“组织法”，一面吹捧我“素孚众望，洽顺舆情”，应出任蒙旗宣抚使。包悦卿、达密林扎布二人并到南京活动，宣传我握有五千骑兵，是蒙古具有实力的人物，大吹大擂了一番。

这两次电报的拍发，和包悦卿的吹捧，引起蒋介石的注意。一九三二年秋，蒋派他的亲信桂永清（当时任军官训练班主任）和军政部派到察盟以枪换马的余玉琼、彭秉离等前来我旗（苏尼特右旗）访问。这时包悦卿也由南京北返，陪伴桂永清一同前来，桂永

清对我是恭维备至。包悦卿曾将蒙古旅平同乡会电请派我出任宣抚使事和桂永清谈了，桂对包说：“我看德王是个年青有为的王爷，宣抚使是老年人干的事，他干这个干嘛？依我之见，应当组织军队，扩充实力，在蒙旗先组织一个骑兵师或旅，当一个中将师长或旅长，不比干宣抚使好吗？”包悦卿当即将此话转告我，我当下表示首肯。桂就给蒋介石打电报，并将电报原稿交由包悦卿转给我看，全文记不清了，仅记得有“将来收拾蒙事者必属此君（指我）”一语。桂对我这样重视和吹捧，使我感到无上的欣慰。嗣他又表示想去看索王，我就派我的专用汽车把他送到乌珠穆沁右旗。他回来向我说：“我看索王凝神注目看人的神气，静听别人谈话的态度，是一个具有成见，十分固执的人，可能对你作些新的事情有障碍，希望你注意及之。”当他临行时，又对我说：“静候佳音吧，蒋委员长可能召见你。”

他走后不久，果然蒋介石就电召我前往武汉相见。我接到电报后，认为机不可失，就偕同补英达赖、韩凤林、丁我愚等前往武汉。路经北平时，曾去面见张学良，张即指示铁路局为我等一行特备专车一辆，并派蒙旗处处长袁庆恩率同宪兵四人护送。到武汉后，行营招待我们住在璇宫饭店，次日即前往行营见蒋。关于桂永清所说组织蒙古骑兵之事，未作详谈，嘱我和秘书长杨永泰、参谋长曹浩森接洽。我见蒋后，就令韩凤林拟具蒙古骑兵师编制计划和所需要的武器，送交行营办公厅。嗣又由杨永泰和曹浩森接见我，说给我“蒙古保安统监”的职务。我当下想到，索王是锡林郭勒盟保安长官，我如担任保安统监的职务，地位就在索王之上，可能引起索王的不满，不如担任蒙古骑兵师长又实惠又相当。当向杨、曹表示不愿接受说：“我此次来见委员长，不是专为要官而来。”话虽漂亮，言甚刺耳，杨永泰闻听之后，马上表现不甚愉快的神气，没有再作什么回答，我就辞出归寓。

嗣闻招待我的韩副官说：“蒋委员长要去长沙视察工作。”我

为了表示拉近乎，亲到长江岸上送行，不意到岸送行者，仅有武汉警察局长陈希曾。接着杨永泰、曹浩森等宴请我，还邀请我坐飞机环绕武汉上空，又招待我参观汉阳兵工厂、长江上的军舰、黄鹤楼等名胜古迹和武汉大学等处。当时武汉小报上曾登有“带着油松大辫子的德王，在武汉大出风头”的消息，被行营给以停刊多日的处分，表示对我的“尊重”。参观各处后，行营秘书邓文仪前来璇宫饭店见我说：“关于编制蒙古骑兵师事，委员长指示以后再行考虑。至请发武器一节，答应拨给机关枪四挺，步枪数百支，可在此具领，另拨迫击炮两门，须到南京军政部洽领。”我遂派丁我愚前往行营军械部门领到机关枪四挺，所发步枪数百支，因系破旧之物未即具领，请再补发新的枪支。

在武汉告一段落后，留下丁我愚洽办未完之事，我就偕同补英达赖、韩凤林等返北平，依据蒙藏委员会关于“重选盟旗代表、改组办事处”的命令，进行组选代表，反对吴鹤龄之事。这时除锡林郭勒盟已确定郭尔卓尔扎布、补英达赖为代表外，乌兰察布盟也确定拉希色楞为代表，伊克昭盟确定僧格林沁为代表，并均已先后到达。其他各盟旗代表就在北平酝酿组选，结果又确定贺喜业勒图默尔根、多尔吉为哲里木盟代表，呼、昭两盟因既已沦陷，又无适当人选在北平，没派代表参加。组织就绪后，代表等就赴京请愿。国民党中委白云梯、克兴额等想利用晋京代表请愿的声势和蒙旗地方实力的支援，特怂恿军政部长何应钦来电邀我赴京洽商蒙事。蒙藏委员会总务处长陈敬修也来北平迎接班禅赴南京，特到嵩祝寺见我，表示欢迎我和班禅同车南往。这时吴鹤龄已被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解除了蒙事处处长职务，调任参事闲散之职，并命令他重选蒙旗代表，改组办事处。吴鹤龄在这种压力之下，感觉对他不利，就匆忙地由南京赶来北平，请于华亭（蒙名罗布桑车珠尔，系吴岳父之喇嘛弟弟，后还俗为镇国公）出面奔走联络，托班禅的堪布和乌兰察布盟的德瓦根敦等为我们居中调解，吴鹤龄偕同于华亭曾亲到嵩祝

寺和我见面。接着又由班禅出名宴请我俩，堪布们代表班禅陪同我俩聚餐，劝我俩合作。继又由德瓦根敦、拉希色楞等出面在擷英番菜馆邀请我俩宴会，进行调停，但我俩均未表示接受。

我和班禅同乘专车到达南京后，一面见何应钦洽办请拨武器之事，一面和进京请愿代表商洽进行反对吴鹤龄、改组办事处之事。桂永清更是时来看我，陪同我往见以关心边事自居的考试院长戴季陶。桂以“蒙古通”自居，向戴介绍说：“我曾亲到锡林郭勒盟各旗访问，知道锡林郭勒盟各旗王公均唯德王马首是瞻。”

吴鹤龄托请巴文峻出面调解，巴曾到中央饭店见我说：“吴鹤龄业已表示愿意奉令改组办事处，他只担任卓索图盟代表，其他各盟旗代表均由新代表担任。”我没有接受巴文峻的调停，并内定补英达赖为新的办事处处长，准备接收。后来因白云梯与石青阳争权夺利，改组办事处之事就被搁浅下来，我表示要整装回蒙，以相对抗。

为时不久，蒋介石由武汉返京，先在励志社宴请我和各代表，继又叫桂永清通知在军官学校单独召见我。届时由桂永清陪同我前往见蒋。寒暄后，桂永清就把建立中央军官学校张北分校计划递上请蒋阅看。蒋略加翻阅即放在一边说：“现在决定在张北设立分校（张北分校后来没有办成），特派桂永清按照黄埔的精神办理，培养蒙古方面的军事干部人材，好做编制蒙古骑兵师的准备。”继又说：“蒙古王公制度是可以存在的，希望不要为此操心。”

现在回想起来，桂永清到我旗访问时为什么向我建议组织蒙古骑兵呢？嗣到武汉见蒋时为什么杨永泰又提出给我蒙古保安统监呢？后在南京见蒋时为什么又提出建立张北分校呢？据我现在的看法，蒋介石这样重视我，是有原因的，对给我职位问题上前后有了变动，也是别有用心的。因为在民国十九年阎、冯倒蒋失败后，阎锡山特派赵太东、仲跻翰二人由蒙人道布顿（曾任察哈尔一个旗的总管）当翻译，想通过我旗前往外蒙，被我旗防卡盘查扣留。我

曾将此事告知察哈尔省主席刘翼飞，我想刘翼飞定告知张学良和蒋介石。从此蒋介石对我可能有了印象，想争取我作为他统治蒙古的助手，并认为我旗是通往外蒙的要冲，有组织蒙古骑兵进行“防共”的必要，同时在蒙古组织起一部分武力，对于附近的杂牌军队也有牵制的作用。所以蒋介石特派桂永清亲到我旗察看情况时，有向我建议组织蒙古骑兵之事。嗣到武汉见蒋时，杨永泰又提出要给我蒙古保安统监名义，不给蒙古骑兵师长的实权，是想利用我作招牌，不愿叫我掌握实力。所以后来在南京见蒋时又提出建立张北分校的计划，这是叫桂永清为他培养军事干部掌握实权，叫我担任空军的保安统监的具体措施。记得在上平解放，我到南京时，桂永清已当上了海军总司令，特在他的家里设宴招待我，并请国防部五个厅、处长、国民政府一个管军事的局长和白云梯等作陪，他情不自禁地流露说：“如果依照我从前的计划，在内蒙组织起来五万骑兵，东北不会叫共产党拿去，也不会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接着他又向我介绍在座的厅、处长：这位是主管军械的，那位是主管电台的，说我如有所需要时，请向他们各位进行接洽好了。通过这一席谈话，足证蒋、桂有意叫我组织骑兵，是以“防共”为第一要义的。其后我在阿拉善旗发动“西蒙自治运动”，前往广州请愿时，桂永清特又给我机关枪四挺、步枪二百支，也是想利用我在内蒙组织“反共”力量，为他们效力，作垂死的挣扎。

在南京见蒋后，我即将韩凤林留下在军官训练班当教官，并以需用军事人材为名，向高级教育班交涉要出了正在受训的蒙古学生云继先，又向军政部洽领迫击炮二门及补发武汉行营许可的步枪几百支，还到中央政治学校蒙藏班参观，和正在求学的蒙古青年做了接触，以期对我有深刻的印象。这时我对于改组办事处之事已感冷淡，又不愿再陷入白云梯等争夺权位的旋涡里，遂分别到各机关访问，各机关首脑也分别宴请我，这样应酬联络了几天。这时外蒙的逃亡者迪力瓦还在南京，我和他常相过从，有一次我问他：“内蒙

搞自治可以不可以？”他答说：“外蒙既可以进行独立或自治，内蒙为什么不可以自治。”这几句话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不愿再在南京作无味的政争，就偕同一部分代表北返。另一部分代表参加了办事处的改组。吴鹤龄的处长改称主任，这一场政争就这样结束了。记得当时报纸上登载着“德王等晋京请愿未遂，拂袖返蒙”的消息。我这次竟落了个乘兴而往，负气而归。所以到北平后，又和旅平蒙古知识青年作了广泛的接触，招收了二十余名蒙古学生，由云继先和于福赓、云敬圣带领着，随我一同返归苏尼特右旗，着手培养人材和力量，备作待机而起的政治资本。从这一段经过中，说明我武汉见蒋是想取得蒙古的军权，赴京请愿是想取得蒙古的政权，但均未如愿以偿，于是便想归来搞自治，实现我的政治野心。

我回旗后，即在西营盘成立了蒙古干部学生队，委派云继先、于福赓二人为教官，把从北平招来的学生一律编入该队受训，把从武汉和南京所领到的武器拨归该队使用。这时我认为即使中央军校张北分校成立起来，毕竟是国民党中央的系统，一切须受他人的监督，不如自办一个学生队，训练自己的干部方便。不久，陈绍武、陈国藩、霍宝书、乌麟、王泽春由绥包一带前来苏尼特右旗，丁我愚、亢仁等也相继前来。我正招致青年来归，当然力表欢迎，推诚相与，常相聚谈，共同研究讨论怎样对待当前紧张时局下的蒙古问题，决定由锡林郭勒盟联合乌、伊两盟发动内蒙自治。这时我俨然以青年领袖自居，以期出问蒙事，掌握大权。

二

我虽然罗致了一部分蒙古青年做为我的臂助和基干，但自知我的职位不过是副盟长，声望不高，年纪又轻，不能领袖群伦。号召各盟旗参加，必须得到年高、“爵尊”之王公的同情和支持，特别是在锡林郭勒盟进行自治，首先必须取得盟长索王的赞同和杨桑

（杨桑曾任过锡林郭勒盟盟长）等老年王公的谅解。杨桑向以我的前辈自居，认为我好大喜功，时常流露不满之意，曾有“锡林郭勒盟出了一个苏尼特王，不知什么时候闯下乱子，锡林郭勒盟前途殊堪忧虑”之语，盟长索王也是对我不满的。因此必须设法说服他们同情自治，最低限度不致出头阻挠自治。经我反复思量，认为通过班禅来说服他们是个最妥善的方法。这个方法还是郭道甫和我谈过的。

记得在一九二九年我随同班禅去沈阳面见张学良洽拨武器，曾与郭道甫（这时郭任东北蒙旗师范学校校长）见面，常相过从，他曾对我说：“外蒙和内蒙情况大致相同，为什么外蒙独立成功？是因为有哲布尊丹巴这个宗教领袖，在蒙古民众中形成了中心信仰。反观内蒙历次抗拒开垦或独立运动都归失败，是因为各自为政，形同一盘散沙，没有中心信仰，以致历次运动无一成功。现在听说班禅的堪布们正请中央用武力护送班禅回藏，一时尚恐不能实现。趁此机会，应当联合各旗集资在蒙地为班禅建庙，请班禅留在内蒙，做为宗教领袖，形成中心信仰，对我们进行蒙事，是会起到一定作用的。”他这个建议，我很以为是，返归锡林郭勒盟后，即和盟长索王商量，索王也即表同意。当派我和松津旺楚克（浩济特左旗扎萨克郡王）代表锡林郭勒盟，前往北平联络各盟旗王公商洽为班禅在内蒙建庙，挽留班禅在内蒙长期居住，各旗王公一致表示赞成。适这时班禅在北平，郭道甫也来平公干，我们就去面见班禅，确定在锡林郭勒盟和哲里木盟各建一所庙。嗣因“九一八”事变发生，哲里木盟已经沦陷，遂将各旗集资十万余元，在我旗和乌珠穆沁右旗为班禅建庙二所，在一九三一年请班禅前来我旗过冬，一九三二年夏在锡林郭勒盟各地唪经。因此，既取得班禅对我的好感，也使锡林郭勒盟各旗王公对班禅有深刻的印象。

迨至一九三二年，我正和青年们研究进行自治，设法说动索王同意时，班禅适由乌兰察布盟百灵庙前来我旗，并要去贝子庙、乌

珠穆右旗等地嗜经。我认为机不可失，遂请班禅帮助我，同他前往乌珠穆沁右旗说服索王。在我们没有到达之前，听说日本关东军参谋田中久曾带蒙语翻译金永昌前来劝说索王赴“满洲国”参观，并要求在乌珠穆沁旗设置特务机关，安装电台。索王因“九一八”事变后，曾派人到过呼伦贝尔盟海拉尔向凌升探询日本对蒙旗的情况，凌升曾答复索王说：“日本最厉害，我们与任何人合作都可以，但不能与日本合作。”因此，索王对日本存有戒心，遂应付说：“你们日本有力量你们就设，要征询我的意见，我是不同意的。”并推托身体肥胖，动转维艰，不能前往，可派协里胡图里前往奉天、长春等地一行。田中久等走后，我陪同班禅到达乌珠穆沁右旗，索王对我提起田中久前来要挟设置特务机关和电台一节，甚感头痛，乏于应付，问我怎么办。我不敢同他直接谈自治的事，答复他说：“班禅佛爷正在此地，何不请求佛爷指示明路。”索王就同我去见班禅，请示对策。班禅即答复说：“前次德王和我说的联络锡、乌、伊三盟会商蒙事很好，现在正是时候了，积极去做就对了。”索王当下也表示赞成，于是第一步说劝成功，就请索王以盟长名义做出公文，盖上盟长大印，派我代表锡林郭勒盟去见乌兰察布盟盟长云端旺楚克（云王），后又加派乌珠穆沁旗的协理若乐格尔扎布一同前往。我遂偕同亢仁、丁我愚、阿乐腾格尔勒等驰赴百灵庙，先派员与云王送去公文并向云王表达请其出而倡导自治之意，云王当时还徘徊不定。恰于此时，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巴文峻等一行前来宣抚，经由四子王旗等地到达了百灵庙，亢仁当将我等候云王前来研究倡导自治问题告巴，我也请巴去劝说云王早来。巴文峻虽然身负宣抚蒙旗归向国民党中央的使命，却对内蒙自治也尽心赞助。他在南京时，曾参加过参谋本部边事研究组，讨论过这一问题，知道地方自治性质的内蒙自治，尚在国民党中央许可之列，遂允前往劝说云王，云王这才表示愿意与我共同倡导自治，当率同其弟根敦扎布和仕官沙拉巴多尔济、那逊瓦齐尔等前来百灵庙。这时乌珠穆沁右

旗台吉若乐格尔扎布亦赶来参加。遂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在百灵庙举行了第一次自治会议，八月二十四日发出通电。当时潜伏在我旗庙上冒充喇嘛的日本特务人员屈目却向韩凤林说：“你们发动自治太早了，时机还未成熟，不如我们日本军的力量到达这里时再进行发动自治为宜。”足见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们向国民党中央要求自治，不感什么兴趣，而是企图在日本的卵翼之下进行自治。九月二十八日召开了第二次自治会议。其后黄绍竑、赵丕廉来百灵庙，经过许多周折，虽然争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一般称百灵庙蒙政会）的组设，但我们极不满意。当下决定除通知各盟旗选定晋京代表要求许可内蒙自治外，并派陈松山（蒙名布仁巴雅尔）前往包头面见孙殿英，请其支援自治。据他回来报告说：“我见孙殿英后，力表内蒙自治绝无其他背景，纯系蒙人迫切的要求，以期把各盟旗团结起来，实行御侮图存，请大力支援。孙殿英甚表同情，并说就是内蒙自治有外人背景，也没有什么关系，他仍尽力支援。”同时我又派韩凤林前往北平日本大使馆分支机构，探询对内蒙自治的态度。韩凤林回来报告说：“我到北平曾见着日本大使馆的柴山武官，请支援内蒙自治，他说现在中日之间存在的问题很多，不断发生冲突，但仍保持邦交，内蒙自治系中国内政问题，日本不便出面干涉。”言下颇为冷淡，对内蒙自治似乎不感什么兴趣。我听到韩凤林报告后，认为柴山武官是日本的外交人员，不便表示对内蒙自治的态度，乃又派补英达赖前往伪满面见溥仪，并通过溥仪的介绍与日本关东军吉冈安置参谋接洽，托辞购买枪支，探询日本关东军对内蒙自治的态度，没有得到明确答复而归。

三

百灵庙蒙政会成立后，仅领到开办费两万元，用以维持办公和职员的生活，每人支给十五元生活费，仅够伙食之用。这样勉强维

持，终非久远之计，即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有关部门请领经常费和建筑费，但尽管函电交催，亦无结果。我为了解决这个面临的迫切问题，特密派陈绍武前往庐山面见蒋介石，一则报告日本人进出西蒙，请示如何对待，再则请拨经常费及枪械电台等物，以济急切需要。结果得到蒋介石的答复，准予拨给经常费每月三万元，建筑费十二万元及枪械电台等物，速向南京有关部门洽领。至于怎样对待日本人进出西蒙问题，蒋介石答复要以不亢不卑的态度相机办理。并囑陈绍武转告我，他不久即来绥远巡视，请我和云王前往相见晤谈，还叫陈绍武给我带来他的复函一封，内容也是和对陈绍武所说的大致相同。

不意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韩凤林被捕事件。这个事件发生的原因，据我了解有三：（一）、在蒙政会成立之后，我派韩凤林为保安处第一科科长，云继先为第二科科长，朱实夫为第三科科长。当由蒙政会下令叫各蒙旗选送蒙兵，责成保安处组织保安队，并派韩凤林随同本会委员托克托胡前往南京与有关机关接洽保安队的编制和请发经费及武器事项。韩、托走后不久，锡林郭勒盟各旗就选送蒙兵前来，我就责成朱实夫主持组织训练。因为乌珠穆沁右旗的蒙兵，不惯基本训练的约束和语言隔阂的关系（朱实夫不懂蒙语、蒙兵不通汉语）对朱实夫有了不满情绪，群向宝道新反映。宝对该旗蒙兵表示同情，反说朱实夫应当迁就蒙兵的生活习惯，在训练上不必操之过急，这种说法当然引起朱的不满。迨韩凤林返后，朱就将这事的经过向韩叙说，希望得到韩的同情和支持，不意韩对朱却未表同情，反说宝道新的意见对，这又引起朱对韩的不满。接着我又发表韩兼保安队的总队长，朱实夫想取得总队附的职位，我也没有给朱发表，这是我对人事安排上失当。朱主持训练保安队一场，落一个费力不讨好，连一个总队附也没到手，当然更为不满。在这以前，蒋介石蓝衣社的特务李才桂率同工作人员以“内蒙旅行团”名义前来百灵庙侦察情况，当时因韩凤林赴京，我就派朱实夫接待

他们。韩凤林返后，李才桂才来拜会我，我对他说：“你如有事，可与韩凤林接洽，因为我事情多，诚恐招待不周。”但是韩凤林却没有很好的接待李才桂，招致李才桂的不满。李曾向朱实夫说：“韩凤林这个人态度傲慢，盛气凌人，很难与之洽谈。”朱实夫曾将此话告我，却未引起我的注意。并且在百灵庙蒙政会成立后，日本人常来锡林郭勒盟和百灵庙拉拢我，我也叫韩凤林充当日语翻译（因韩是日本留学生，在士官学校毕业），朱实夫也可能把这事向李才桂反映。其实韩凤林是个民族主义者，仅仅做了我的日语翻译，并无拉我投日的行为。记得我曾和他谈过：“在当前时局下，我们要利用日本的力量，把蒙古复兴起来，你看怎样？”韩对我说：“我在日本留过学，深知日本的满蒙政策是不怀好意的，应当十分注意。”李才桂认为韩凤林有拉我勾结日本的行为，便报告了驻在北平的国民党宪兵第三团团团长蒋孝先，当韩凤林赴北平忌戒大烟瘾时，就被宪兵三团逮捕。这是可疑原因之一。（二）、韩凤林由南京返回我旗时，曾向我报告说：“我在南京充当军官训练班教官时，桂永清曾一再拉我入蓝衣社，我坚决表示不肯，愿意回蒙工作。”由此推断，因为韩凤林拒绝参加蓝衣社而遭忌于桂永清，也是很有可能的。记得在韩凤林被捕后，我曾电请桂永清居中营救，桂给我复电仅一句话：“我已将原电转呈委座了，”表示甚为冷淡。这是可疑原因之二。（三）、百灵庙蒙政会成立之后，由吴鹤龄介绍赵汇川，由万福林介绍刘建华前来百灵庙，我都委以工作。嗣我发现赵汇川有曾扩情给他的密电本，他知道被我识破后，反将密电本献出，以实告我，表示忠诚。我曾嘱他将蒙政会经费未发，工作人员不安情况密电曾扩情，希他转以告蒋，促使经费的速发。当时关起义任蒙政会电台总台长，认为赵汇川私发密电，形迹可疑，曾向我告密。我说这事我知道，叫他把电报打出去吧，关起义也就放心了。但赵汇川是否持此密电本或以其他信函方法密告情报，我再未注意防查。至于刘建华也与蒋介石的特务组织有密切关系，曾给

韩凤林馈赠八音子手枪一支，无非是想买好韩凤林，并想通过韩凤林的关系取得我的信任，便于作特务工作。当韩凤林赴平忌大烟瘾时，赵、刘二人随同前往，到平后的次日，赵、刘二人说下午亲到韩家来打牌，嘱韩在家等候，不意届时宪兵三团的官兵十数人乘坐大汽车前来韩家，即将韩捕去。捕韩的汽车刚经开走，赵、刘二人即赶到韩家，未受株连，此为可疑原因之三。

韩被捕后，蒙政会驻平办事处处长包悦卿曾面见何应钦要求释放，质问何应钦说：“韩凤林究犯何罪，竟被宪兵三团逮捕，什么三民主义，简直是害民主义；什么青天白日，简直是暗无天日。”何应钦矢口否认，允为注意访查下落，设法营救。但韩终未得释，仅由北平军分会给韩的家属送去五百元，作为慰问救济之资。在蒙政会成立后，我曾派包悦卿、郭尔卓尔扎布赴平敦请何应钦就任指导长官，何应钦答复不久来绥转赴百灵庙。适在韩案发生时，何应钦来绥包视察，白海风劝我迎何前来，我很负气地说：“他把韩凤林捕起来，还欢迎他来干嘛？”仅去电报请何前来。何答称急待返平，无暇前来。为了援救韩凤林，我曾迭电蒋介石报告李才桂与韩案有关，要求释放。蒋来电答复说：“韩案发生，蒙胞既然怀疑才桂，显见才桂有不洽蒙情之处，应即撤销其内蒙旅行团团长的职务。”不久李才桂就离开了百灵庙。

到了是年秋天，蒋介石将到绥远视察，在他未到之前，先派萧振瀛带着金丝猴皮袄等礼物前来百灵庙，邀我和云王赴绥见蒋。我同蒙政会的中上级职员讨论研究可否赴绥，多数认为我与傅作义的关系不好，外边又有谣言，深恐赴绥被扣，劝我不要前往，以防不测。嗣我又与陈绍武单独商量，陈对我说：“我前次赴庐山见蒋时，蒋对您非常器重和关怀，并且您派我赴庐山就是为和蒋拉拢感情。这次蒋以国家元首的资格到绥巡视，你是蒙古地方长官，正应前往相见，作进一步的拉拢，便中还可商洽解决绥蒙之间存在的纠纷问题，应当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前往，不要前怕狼

后怕虎地顾虑，以致坐误时机。”我也认为既系蒋介石相邀，谅傅作义不会把我怎样，遂和云王、包悦卿、陈绍武等赴绥等候见蒋。

蒋介石由宋哲元陪同到达绥远车站时，我和云王曾到车站迎接，蒋下车后首先与云王和我握手，接着蒋又召见我和云王，包悦卿、陈绍武也随同进见。蒋先问云王：“蒙政会成立之后诸事如何？”云王答称：“我是年老多病，诸事多亏德秘书长（百灵庙蒙政会成立，云王任委员长，我任秘书长）帮同办理。”蒋又面向我说：“方才听云王说，你帮助他很好，今后仍希你尽力帮助云王，作好蒙政会工作。”我当将韩凤林被捕之事提出，要求蒋设法营救。蒋答复我说：“这事我返京后当详为查问，待到一月后总会得个水落石出。”接着我又向蒋表示，蒙政会愿敬献军马三百匹，答谢中央许可自治关怀蒙古的盛意，蒋也表示接受。谈话到此，我们就告辞归寓。继而绥远各界首脑又举行欢迎蒋介石训话会，邀我和云王、包悦卿等参加。训话会开始时，首由傅作义致词，继由蒋介石训话，蒋训话后，邀请云王和我讲话，云王推托未讲，我遂登台致词说：“自清朝以至现在，国家最高元首只有两次到达我们这个边远地方，前次是康熙皇帝，这次是蒋委员长。但是康熙是为征服我们蒙古而来，蒋委员长是为帮助我们蒙古而来。我们表示竭诚欢迎。”我用蒙语讲完后，由包悦卿用汉语翻译，蒋介石听了我这套吹捧之词颇为高兴。

我从绥远见蒋返回百灵庙后，当用蒙政会的经费购买军马三百匹，派补英达赖偕同刘建华送往南京军政部。约经一个月的时间，接到以“北平民众锄奸团”名义印发的一个传单，大意说“韩凤林是勾结日本，背叛党国，出卖民族的汉奸，实属罪大恶极，为全国人民所痛恨，已经作了断然处置，沉之大海。”我接到这个传单，经和丁我愚研究，认为这是蒋介石耍了一个花招，不好正面的明确答复，来一个侧面的传单作为变相的通知。由此推断韩凤林这个人可能是没有了。但营救之心仍然未死，在无望中再求万一的希望。于

是就叫了我愚拟具了一个电报，详述李才桂前来百灵庙作暗地侦察和不满韩凤林的情形，以及韩到北平时被宪兵三团逮捕的经过，以云王和我的名义，再电请蒋介石予以释放，并坚定表示如再不释放，我等身负蒙政会的要职，连一个职员都不能保护，实在无以对同仁，只好恳请辞职，以卸仔肩。不料这个电报发出后，惹起蒋介石的恼火，当来复电责备我们说：“君等任意推断，肆意要挟，尚知国家有纪纲否？”

我为了弄清蒙政会内部与韩案有关人员，特令稽查处主任李凤诚检查来往信件，发现云继先给朱实夫来的一封信，其中大意说：“韩凤林被捕后，秘座（指我）对实夫兄怀疑甚大，应加注意。对保安总队长一职，务要尽量争取，我们谁干都可以，务使不要落于他人之手。”同时又据曾在干部学生队受过训的人员向我告密说：“云继先、朱实夫联络在蒙政会任职的土默特旗籍人员，策划掌握保安队的官兵，争取保安总队长的职位。”因此，我对云、朱有了怀疑，云、朱对我也有了戒心，这就种下了后来云、朱策动保安队兵变反正的根源。

一九三四年秋天，日本驻在天津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乘坐飞机前来我旗活动，其目的是想拉拢我进一步靠近日本，我也就以礼相待。他对我说：“你进行蒙古工作怎样？有没有困难？如有困难时，可向我说，我当尽量帮助。”接着他又自吹自擂地说：“我到哪里，中国官员都怕我，因为中国政府的事情都瞒不了我。”我就对他说：“我们蒙政会保安处科长韩凤林，在北平被宪兵三团逮捕，现在生死不明，希望你帮助调查了解一下。”他很自负地说：“我能有办法知道，俟我详细调查一下再行告知你。”过了一个时期，他就将关于探询韩案的经过，通过驻在我旗的日本特务机关长穴浦转告我说：“国民党中央宪兵第三团团团长蒋孝先赴庐山向蒋介石请示机要工作时，蒋介石就命令蒋孝先速把韩凤林设法逮捕处死，蒋孝先即密电驻在北平的中央宪兵第三团吴团附负责处理。

当韩凤林来平时就有特务人员尾随前来，韩到平后即进行逮捕，当天晚上即行枪杀。”后来在伪蒙疆时期，我主持举办韩凤林（蒙名胡克巴图尔）追悼会，追赠以“中将”的头衔。并派赵汇川、刘大光二人前往北平寻找韩凤林的尸体，经过当时伪北平市长袁良的协助，终于找到，另行埋葬。

韩凤林事件发生后，我采纳了关起义进行多边外交的建议，派刘建华赴广州和正在搞西南独立的胡汉民、陈济棠集团取过联络，请其支援内蒙古自治。刘建华到达广州后，把我大吹大擂了一番，夸张说我在内蒙有五万骑兵云云，但也没有什么结果。只是他得了胡汉民赠送的旅费五百元，返回百灵庙时，给我带来一个用象牙镌有胡汉民、陈济棠、周佛海、萧佛成等十数人名字的精致赠品和信函一封，仅表示愿意赞助，没有实际支援。我也认为西南与内蒙古相距甚远，仅能声援，无补实际。

从此，我就进一步与日本帝国主义勾搭起来了。

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前后

亲赴长春与关东军勾结

伪蒙古军政府的成立，是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伪蒙疆政权的正式开始。当时虽已有了在蒋政权隶属下的蒙政会，但不能满足我的政治野心，并且蒋介石杀了我的得力干部韩凤林，令我非常不满，又加在西公旗事件和特税问题上，我与绥远当局的斗争也着着失败，使我更为气愤。因此，在百灵庙蒙政会时期，我就和日本方面暗行拉拢，企图凭借日本的力量，扩充实力，以达成建立“蒙古国”的妄想。到了一九三五年冬，我便亲自出马，和日本关东军直接勾结。这时我由百灵庙返锡盟苏尼特右旗，日本关东军特来电报邀我前往伪满新京（即长春）商谈要事，我即偕同迪力瓦、陶克陶和驻在我旗（苏尼特右旗）的日本特务机关长穴浦、中岛万藏等乘飞机前往，面见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和西尾参谋长。旋即和坂垣副参谋长、田中隆吉参谋等商谈，结果商定：日本帮助西部蒙旗先搞一个“独立局面”，继而建立“蒙古国”，并送给五十万元和五千支枪，作为扩编军队之用。

我由长春返旗后，就和穴浦商量，关于搞“独立局面”、成立统一机构问题。穴浦建议说：“现在日、蒙既经合作，统一机构必须从速建立，我看最好是进一步强化百灵庙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作为统一指挥机构。因为这样做是承认已成事实，易于发挥统一指挥的作用。”当时我认为这事有和蒙政会委员长云端旺楚克（云王）研究的必要，就带了十万元前往百灵庙交到